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书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 述 评

主 编 郭德宏 李玲玉
副主编 柳建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

主 编 郭德宏 李玲玉
副主编 柳建辉



20101873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郭德宏, 李玲玉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7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书

ISBN 7-5035-1800-6

I. 中… I. ①郭… ②李… III. 中国共产党-历史事件-
党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3633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3001—6000 册

定价: 14.00 元

DH85/12
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

成 员 名 单

主 任： 汪家镠

副主任： 苏 星 龚育之 邢贲思 刘海藩
杨春贵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齐彬	王伟光	王聚武	王瑞璞
刘炳瑛	刘景禄	朱乔森	陈登才
张绪文	吴雄丞	赵 曜	盖 军
韩树英	蔡长水	臧志凤	

前 言

本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的配套教学参考书，旨在通过对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评述，加深理解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中已写的内容，这里不再重复，所以本书所选历史事件不够系统和全面，特此说明。

参加本书撰写的同志有何仲山（一）、刘晶芳（二）、李东朗（三、四）、李玲玉（五）、王海光（六、十一、十三、十四）、张珊珊（七、八）、谢春涛（九、十二）、郭德宏（十）、柳建辉（十五、十六）、陈述（十七、二十一）、汤应武（十八）、陈雪薇（十九）、赵素芬（二十）、李璠（二十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室务委员王洪教授、原第三研究部主任王洪模研究员，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盖军、陈诗惠教授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中央党校教务部常务副主任岳长龄教授、副主任李援朝教授、教材处徐跃、谢文捷同志以及党史教研部刘文军教授参加了本书的组织编写和编务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 者

1998年3月

目 录

一	从三二〇事件到四一二政变中共中央的决策及经验教训.....	(1)
	(一) 对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阴谋活动一味退让、妥协	(1)
	(二)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中的右倾投降主义	(7)
	(三) 四一二政变前夕,仍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	(11)
二	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的一场争论.....	(16)
	(一) 红四军的状况和争论的由来	(16)
	(二) 红四军七大——一次不成功的会议	(23)
	(三) 红四军九大——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	(26)
三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和确立.....	(31)
	(一) 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领导的变更	(31)
	(二) 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35)
	(三) 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几次挑战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42)
四	延安整风中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	(48)
	(一) 整风运动中中央关于审干的决定	(48)
	(二) 审干运动的全面展开	(52)
	(三) “抢救运动”的骤然兴起.....	(57)

(四) 对“抢救运动”的甄别工作	(60)
五 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	(64)
(一) 召开新政协、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	(64)
(二) 召开新政协, 建立新中国	(71)
(三) 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团结共事的典范	(74)
六 建国初期的文化思想批判运动	(78)
(一)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78)
(二)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 批判	(82)
(三)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胡风反革命 集团案”	(86)
七 高岗、饶漱石事件评述	(91)
(一) 高、饶问题发生的环境与原因	(91)
(二) 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	(96)
(三) 对高、饶问题的处理及其经验	(100)
八 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103)
(一) 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103)
(二) 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变	(108)
(三)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及其教训	(112)
九 “大跃进”运动	(117)
(一) “大跃进”的酝酿和发动	(117)
(二) 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高潮	(120)
(三) 八个多月的初步纠“左”及其中断	(123)
(四) 继续“大跃进”及其严重后果	(126)

十 1959 年庐山会议的转向及教训	(129)
(一) 众说纷纭话庐山	(129)
(二) 认识上的根本分歧	(131)
(三) 与国外斗争的联系及对“里通外国”的 怀疑	(135)
(四) 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	(138)
 十一 城乡“四清”运动.....	 (143)
(一) “四清”运动的酝酿和准备.....	(143)
(二) “四清”运动的发动和高潮的掀起.....	(146)
(三) “四清”运动的分歧和结束.....	(152)
 十二 从结盟到对抗：中苏关系的历史演变.....	 (156)
(一) 苏共二十大后出现的分歧	(156)
(二) 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160)
(三) 苏联撤走专家和撕毁合同	(163)
(四) 中苏论战和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	(165)
 十三 刘少奇冤案始末.....	 (171)
(一)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分歧.....	(171)
(二)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173)
(三) “打倒刘少奇”活动的升级.....	(175)
(四) 残酷的迫害	(178)
(五) 冤案的成因	(182)
 十四 林彪集团的兴亡.....	 (185)
(一) 林彪集团的兴起	(185)
(二)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争斗	(189)

(三) 铤而走险的“五七一”工程	(192)
(四)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195)
十五 1975 年的全面整顿及其夭折	(200)
(一) 邓小平的复出	(200)
(二) 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	(202)
(三) 全面整顿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	(208)
(四)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和全面整顿的中断	(211)
十六 江青集团的崛起与垮台	(215)
(一) 江青集团的产生及作乱	(215)
(二) 江青集团的崛起与“组阁”梦的破灭	(219)
(三) 江青集团的反扑与垮台	(225)
十七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230)
(一) “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之争	(230)
(二) 胡耀邦提出“实践标准”	(234)
(三)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235)
(四) 全国大讨论	(238)
十八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历史意义	(242)
(一) 为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	(242)
(二) 全会的主要内容和伟大功绩	(247)
(三) 实现伟大转折的原因	(253)
十九 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始末	(257)
(一)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历史进程	(257)
(二) 平反冤假错案的内容	(265)
(三) 值得总结的两点历史经验	(268)

二十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兴起与推广	(271)
(一) 联产承包责任的兴起	(271)
(二) 联产承包责任的推广	(274)
(三) 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	(276)
二十一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前后后	(279)
(一) 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	(279)
(二) 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	(281)
(三) 南方谈话的重大反响	(287)
(四) 新阶段的到来	(289)
二十二 建国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交涉始末	(291)
(一) 香港问题的由来与新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291)
(二)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295)
(三)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及其重要意义	(303)

一、从三二〇事件到四一二政变 中共中央的决策及经验教训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从三二〇事件开始，中共中央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一再退让，使蒋介石逐步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结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阀的资助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使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中共中央在这一历史阶段决策方面的经验教训极为深刻，很有必要加以认真总结。

（一）对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阴谋活动 一味退让、妥协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左派取得很大胜利。会议代表22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68人，中派65人，右派仅占45人。共产党员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实际上主持会议。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担任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1000余名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除第五军外，其余各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一军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7

个是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群众基础大大加强。当时，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约10余万，农会会员约60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2000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

一身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大要职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汪精卫，这时表现得非常左倾。据张国焘回忆：他“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①。国民党二大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内容为反对帝国主义，汪精卫还没看完，就说内容很好，可作为大会宣言的资料。会议期间，汪精卫多次强调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在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的而生存下去^②。在选举中央委员前，他预拟了一份名单和中共商量，其中左派以及和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③。1926年2月1日，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议上，提议任命共产党员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④。5日，又提议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⑤。2月22日，他在纪念苏俄红军成立8周年联欢会上，发表演说称：“吾人对于如师如友而助我的俄同志，真不知如何表示其感激之情，惟有镂之心中而已”^⑥。对于共产党员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暗中操纵的新右派群众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他也鲜明地左袒。3月初，他召集两会会员训话，激烈地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称：“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⑦

①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年版，第479页。

②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479页。

③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482页。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465页。

⑤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471页。

⑥ 《广州国民日报》，1926年2月24日。

⑦ 转引自蒋介石：《复汪精卫书》。

由于孙中山生前亲自制定并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方针，特别是由于苏俄在军事上、财政上大力援助广东国民政府，苏俄顾问团这一时期的地位和影响也明显加强。国民党的工作计划、章程等均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制订。他们提出的建议，基本上都被国民政府接受和实行。苏俄顾问控制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部门，成为这些部门事实上的头头，只不过在职务上被称为这些部门首领的顾问。1925年12月末，有的顾问甚至占有海军局长（斯米诺夫）和空军局长（列米）的官方位置。

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老右派西山会议派称：“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又称：“军政大权已完全在俄人掌握之中。”

新右派头子蒋介石，通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掌握了广东的主要军事力量。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他“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①。他企图通过即将到来的北伐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他把正在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做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为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他同汪精卫的矛盾也突出起来。

1926年2月26日，蒋介石突然扣留亲近汪精卫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二天将他押送出境，改派自己的亲信刘峙担任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师长，消除了后顾之忧。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指广州）办事处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调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115页。

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蒋介石的党羽诬称共产党阴谋暴动，要炮轰黄埔，劫持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等。3月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擅自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对汪精卫的住宅也以“保护”名义包围。广州陷于一片紧张恐怖之中。这就是所谓中山舰事件，亦称三二〇事件。

当时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广东有很大力量，这次行动带有试探的性质。他制造事端后，很快又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由于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因此，“自请从严处分”。

事变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同苏联顾问团商议对策，主张给蒋介石以回击。毛泽东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执委和中监委秘密撤离广州，到叶挺独立团的驻地肇庆、高要一带去；然后开会通电声讨蒋介石，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①但是，苏联顾问季山嘉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不赞成反击。尤其是当时在广州访问的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联视察团团长布勃诺夫害怕反击会影响中苏关系，并认为顾问团自身的工作有严重缺点，也主张对蒋介石让步。他们在得到蒋介石“对人不对俄”的回答后，表示如此即可安心，并答应让季山嘉等人回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这个突然事变既缺乏精神准备，也缺乏应付的经验。开始中共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认为事变同广州同志工作上的错误有关，不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而是“当退让没有退让”^②。认为蒋介石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只有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

① 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② 李立三：《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1930年1月。

伐。中央派张国焘为代表到广州执行这一妥协政策。张国焘在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上说：“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①。

张国焘在同蒋介石谈判时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特地来看望蒋的，中共始终支持蒋，并“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②；同时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也没有接受他们的这一主张。

汪精卫当时是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但在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淫威之下感到孤立，一筹莫展，称病离职去欧洲。4月16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汪精卫“病假”期间由谭延闿任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由于中共中央在处理三二〇事件上的妥协退让，使蒋介石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通过这一事件，蒋介石摸清了共产党人的弱点，使他有恃无恐地加紧反共活动。这一事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接着，蒋介石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4月6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准备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苏联代表、国民政府首席顾问鲍罗廷在北京，他回到广州后，在同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问题时，为了贯彻共产国际提出的要求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并促使蒋介石北伐的方针，对蒋介石作出让步，同意他提出的“整理党务”的8条。

①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505页。

②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506页。

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样，也决定对蒋介石的要求采取妥协态度。他们派张国焘到广州指导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党团内部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意见不一致，讨论7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①。这样，在1926年5月15日至2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

《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1/3；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

蒋介石的反动提案被通过后，中共中央决定逆来顺受，6月4日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除重申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則外，着重表示：“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②似乎《整理党务案》与中共毫无关系。殊不知，当时的国民党系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而非纯粹的一个政党，因此，整理党务必然事关两党。

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使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大权。《整理党务案》通过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包括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全部离职，换上国民党右派分子。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3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中的右倾投降主义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风暴迅速席卷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仍然留在远离革命中心地区的上海。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以至一步步滑向右倾投降主义。

还在北伐出师前，苏联军事顾问加伦曾请周恩来询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让张国焘主持开会讨论，但开会时并没有真正讨论，只由张国焘说了一句话：“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很长时间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使他的实力在北伐中极大地膨胀起来。

蒋介石专横跋扈，凭借夺取的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指使许多地方的反动派打击工农群众运动。他的倒行逆施不仅激起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也引起国民党左派、国民革命军中一些将领和黄埔军校师生的不满。当时还在欧洲的汪精卫仍被看做国民党左派领袖，因此，从1926年7月起，国民党一些省市党部纷纷电请“汪精卫销假视事”。9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党权高于一切”，“提倡党内民主，反对独裁”的口号。10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党部联席会议上，通过几个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议案。反对蒋介石独裁，“迎汪复职”的呼声越来越浓厚。

蒋介石对于“迎汪复职”的呼声惶恐不安，担心汪精卫回国削弱自己的地位。但他感到处境不利，不得不在表面上拥护“迎汪”，同时派代表找中共中央寻求支持，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这显然是反击蒋介石，夺回被他篡夺的那部分权力的大好时机，然而，中共中央却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针。